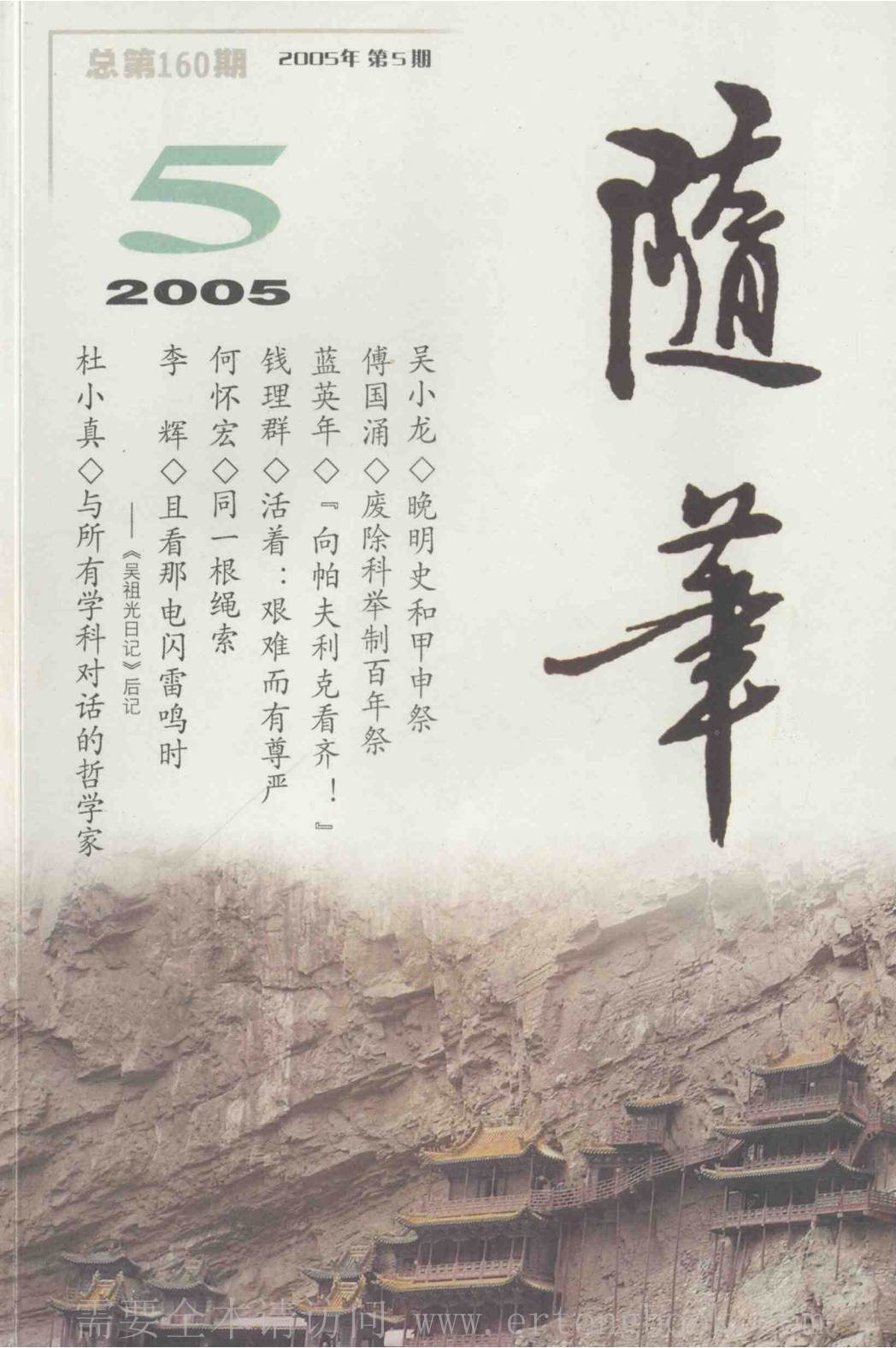
总第160期 2005年 第5期

随笔

5

2005

吴小龙◇晚明史和甲申祭
傅国涌◇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
钱理群◇活着：艰难而有尊严
何怀宏◇同一根绳索
李　辉◇且看那电闪雷鸣时
——《吴祖光日记》后记
杜小真◇与所有学科对话的哲学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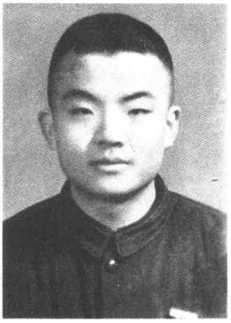
《随笔》影像之二

钱理群



乐乐 摄

1939年生，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学术著作，《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压在心上的坟》等思想随笔。近年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并主编《新语文读本》。



摄于1956年10月，刚考上北京大学之中文系新闻专业。



摄于1969年贵州安顺，刚从“牛棚”放出来，即洗澡、理发，并留影纪念。

刊名题签：茅 盾

随笔

主编 秦 颖
特邀副主编 向继东
副主编 麦 婵
编辑部主任 海 帆

目录

2005 年第 5 期 总第 160 期

吴小龙 \ 晚明史和甲申祭 \ 3
傅国涌 \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 10
肖雪慧 \ 重估国学价值还是“弘扬”传统意识形态？
——我看《重估国学的价值》 \ 19
张 鸣 \ 在私塾和读经之间 \ 26

蓝英年 \ “向帕夫利克看齐！” \ 33
林 达 \ 一个从军事学院走出来的政治家 \ 43
杜小真 \ 与所有学科对话的哲学家 \ 52

邵燕祥 \ 小随笔 \ 60
从维熙 \ “古镜”新说 \ 68
俞雷庆 \ 读红楼引子 \ 75
吴 江 \ 哀李白 \ 79

龚育之 \ 旧游琐忆 \85
朱铁志 \ 资源枯竭型作家的现实选择 \ 88

钱理群 \ 活着：艰难而有尊严
——为钟朝岳先生六十九寿辰而作 \ 91
附：钟朝岳 \ 九死一生
林斤澜 \ 送唐湜 \102
王得后 \ 感怀伊藤虎丸先生 \106

王思睿　何家栋 \ 罗隆基的人权思想 \114
邵　建 \ 面对苏俄：1926 年的胡适和 1927 年的鲁迅 \ 123
李　辉 \ 且看那电闪雷鸣时
——《吴祖光日记》后记 \ 131
黄伟经 \ “尽量说真话”及其他
——《萧乾文萃》读后 \ 140
舒　展　文　丁　聪　图 \ 宗江“三绝” \ 147

何怀宏 \ 同一根绳索 \ 150

编读桥 \ 勘误 \ 74　启事 \ 101　稿约 \160
封　面 \ 北岳恒山 \ 胡　岚 摄
封　二 \ 《随笔》影像之二：钱理群 \ 乐　乐 摄
封　三 \ 广东中国画品读之五 \ 苏小华

平面设计：苏家杰　印刷主管：岑宇峻　编务：李珊珊　本期责任编辑：麦　婵

晚明史和甲申祭

吴小龙

前一阵读刘志琴先生的《晚明史论》，感慨良多；注意到国人的关注似乎在从晚清史转向晚明史，更是令人感慨良多。晚清和晚明，同是末世，却也风貌各异。一部晚清史，让人看到了回天无力然而却始终不断的挣扎——从乱世能臣的中兴努力，到年轻君主的急切改革，从富国强兵的功亏一篑，到时至末季时的自救“新政”……其间不乏统治者和不同阶层、集团的不断尝试、努力、乃至垂死一搏。虽然终于是时运已去，但也好歹曾经“屡败屡战”。而晚明史可就不同了。应当令人惊讶的是，晚明史中我们看到了统治机构几乎自行解体的荒唐局面。虽然到最后关头出了一个崇祯皇帝企图力挽败局，他的作为也确实并不全然像一个亡国之君，然而他却还是成了那个“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贾探春，他那来得太晚的改革，只是加速了亡国的进程。我曾经在评论一个与晚明史毫不相干的外国政治家时说过，“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会断送思想者，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看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死亡。专制体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所消除，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这块西西弗斯的巨石啊？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解堕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就像刘志琴先生的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现象：在上，“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在下，“地方官员更是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据《明通鉴》统计：“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焕，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似乎只是靠着某种惯性在有气无力地滚动、苟延。

首辅叶向高目睹时政之败坏，愤而辞职，他悲叹：“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腑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他对这种局面充满了忧虑：“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不知这位因无力抗衡阉党而辞相回籍的尚书阁老，在写下“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车马乱纷拿。欲知此后春相忆，只有丰台芍药花”的美好诗句时，究竟是深情和忆念，还是感慨和无奈？

这么一种局面，竟然能够继续“死而不僵”地苟延残喘百

余年，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费解。细想起来，理由可能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恰恰是王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乃至瓦解使得“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有了喘息的间隙和可能，其间虽然间或有天灾人祸，有税吏之横暴、有局部之民变，但是在其时的资讯条件下，只要信息不传播，则民变也就不蔓延，局部造反不会引发全局性的骚乱，于是，民众就在相当低的水平线、相当恶劣的生存状态中勉强“活着”——只要没有流民起义像“大串联”似的把动荡的信息传播到各地，局势也就在崩溃瓦解的临界点附近苟延。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社会本身的周期、节奏极为缓慢，于是，除非在短期内出现过于暴烈的天灾和人祸，例如连续的严重灾荒，再加上过于残酷的人为盘剥，就不至于酿成大祸。一般情况下，大动乱多是在连续几年的灾荒之后，再加上政府依然横征暴敛才引发的。所以，应该说，正是农业社会本身的特点，是它那极为缓慢和迟滞的周期和节奏，挽救、或者说维系着濒于解体的晚明王朝。

但是苟延残喘毕竟是苟延残喘，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也终于不可能永远垂而不死。而在提到明朝的灭亡时谁都不可能不提到的，是李自成，是甲申年。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是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一段过去的历史碰巧不幸与现代的历史深深纠缠在一起。而这一纠缠的中介环节则是郭沫若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而且晚明史，就曾经基本上被归结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所提供的“教训”，这就更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

平心而论，郭沫若这本曾经影响很大的书并不是认真的史著，却应当算是影射史学的杰作。他要骂的是国民党。这从作者不无得意的附识中可以看出：“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而这位四川才子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的大

著的收篇之处更是驰骋诗人的想象力，对那一段晚明历史作了这样的总结：

>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一连好几个“假使”，让人不禁企盼：历史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但即便如此，那建立起来的也还不过是一个延续着周期律的“大顺王朝”，而且，它也一定逃不脱作者毫不客气的论断：“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唉，这种王朝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又何必我们为之歌哭痛惜呢。

本来，郭沫若写此书的本意更多的是在现实而不是历史。他对胜利者骄傲自满、屠戮功臣、政治腐败等等的警告本意也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对这些谴责，国民党当然当之无愧。

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内战的烽火又在燃起，“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这，确实表达着一个忧国之士的悲愤。但是这种忧愤和种种“假使”却不能稍稍把历史推向一点点光明。我看到章立凡先生在一篇题为《甲申再祭》的文章中再次替国民党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很好：“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长期以“训政”的名义，实行专制集权，“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这个以发动工农搞“国民革命”起家的革命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却悍然无视甚至践踏“农民的利益诉求”，直至走向他们的对立面。“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熬过艰苦的抗战，中国居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大小官员开始陶醉于文恬武嬉的盛世美梦，竞相开始了以“接收”为名的利益攫夺。腐败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而“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这里的许多话是说中了要害的。不能不说，比起“三百年祭”中的警告，这是甲申又经历了整整一个轮回之后的更为深刻的总结。

但是有趣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原本是针对当时的执政者的警告却引起了未来的执政者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接过了郭沫若这篇文章的话头，做了一篇更大的“文章”。这恐怕是郭沫若所始料未及的——也因此使他的这篇文章彻底成了“史为今用”的范本。在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争相转载，各解放区还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

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也联合通知，强调《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并告诫各级组织，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又在致“沫若兄”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直至大局初定，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之时，毛泽东还在以“进京赶考”者自居，念念不忘要大家接受李自成的教训。甚至于建国之后，毛泽东依然在反反复复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不能说他没有历史感，也不能说他没有使命感和某种“高瞻远瞩”。对于接受前人教训的高度重视和一再强调，恐怕古今中外，没有人曾经超过他。但，在建国初期那几年短暂的“兢慎”之后，他老人家又如何呢？

《甲申三百年祭》的命意在于“接受教训”，当时读者中的有心人也确实理解、接受并且反复再三地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显然，从历史往事中仅仅“接受教训”看来是不够的、靠不住的。毛泽东要接受教训是对的，有几年他似乎做到了，于是就对历史充满了乐观，对未来充满了自信——而就在这时候，他输掉了“进京赶考”，陷入了“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的无情的“周期律”。由此可见，接受教训毕竟属于主观问题，还不等于建立制度——“教训”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一时容易，永远接受就未必容易，甚至于可能一代人接受了，也还会有下一代的不接受。无论如何，这种主观愿望是敌不过利益和体制的力量的。

因此，无论是多么英明的君主，你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

们“接受教训”的“兢慎”之上——如果没有一种制度的保证的话。毛泽东曾经说他找到了方法：“那就是民主。”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去实行。于是，周期律、历史的宿命，就回来了。所以应该说，今天看来，“甲申祭”的意义绝不只是“教训”——更何况，“甲申祭”也还不是全部的晚明史呢。

无论再经历多少个轮回，“甲申祭”总还是会有人提起的。如果要祭，我想还是让我们怀着一种戒惧和敬畏祭一祭那个周期和宿命吧。

《花城》2005年第五期目录

长篇小说　换位 / 矫　健
中篇小说　萎缩 / 陈　川
　　夏雨的长江 / 方格子
短篇小说　身体的游戏 / 徐　岩
　　剃头记 / 李师江
　　夜猫子酒馆 / 梁　弓
散文随笔　上路 / 李伯宏
　　郎木寺札记 / 人　邻
　　大雁的歌 / 张宇航
诗　　歌　我此生丧失于湮灭不存的世界（五首） / 贾晓伟
　　水颂 / 王明韵（组诗）
乡村经验　乡村社会的饮食和食物体系 / 张　柠
现代流向　泼皮短语、流氓肖像和情色叙事 / 朱大可
花城论坛　大话文学·犬儒主义·后全权社会 / 陶东风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花城》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06288－487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12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傅国涌

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废止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至今整整一百年了。百年之后，让人想不到的是，为科举制招魂的有人，为科举制评功摆好的有人，为科举制鸣冤叫屈的有人，言下之意似乎都恨不得重新恢复科举制。其实，不说远的，即使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包括“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就一直没消失过，类似的各级考试制度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科举制废除百年后，对我们而言，重要的还是要反省这一制度曾给一个民族带来过什么、阻碍了什么，科举制的废除造成什么最重要的变化，而不是从技术层面孜孜于考试不可废，众所周知考试不是万能的，没有考试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办法，考试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是不坏的选择，从来不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成为支撑一家一姓的王朝政治的重要支柱，号称“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得意忘形之际，禁不住感慨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正是科举制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读书人一网打尽，让他们皓首穷经、将所有的精力、才华消耗殆尽，目的就是沿着既定的科举之路一步步往上爬，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千百年来，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最好不过地证明了，科举本身已成为目的，读书人只有这一条独木桥可走，没有其他的选择，读书、作文、考试，一切都围绕着科举这个轴心转动，这几乎是帝王恩准的允许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是收罗天下英才的不二法门，在这里读书的目的不再是求知，不再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不再是磨砺思想、追求真理的阶梯，读书就是为了考试、为了获得晋身之阶，读书与做官通过科举制的纽带紧紧地绑在一起。

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千年长夜里没有产生出什么值得后人认真对待的思想创造、科学发明，千年仿佛一瞬间，一切都是重复，八股文、策论，加上点吟风弄月、言志抒情的诗词，成了中国人全部知识生活的核心。不能说这完全是因为科举制度造成的，在根本上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科举制度的发明也是围绕着这样的目的，质言之就是要维护家天下，为帝王所用。一家一姓的喜怒哀乐从此覆盖、乃至取代了大地万物、芸芸众生的全部生活，从身体到精神，再也没有超越于帝王威仪之外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度从来都是帝王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皇权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条帝王选拔奴才的行之有效的流水线。并不像有些人讴歌的那样，这是一个蕴涵了公正、平等理想的美好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有平民子弟通过苦读指定的经书，因缘际会，从底层社会一夕之间跨入庙堂之高，然而，这只不过是给皇帝增添了一个帮忙或帮闲者，丝毫也不会触动等级分明、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本身。读书破万卷的钱穆先生其生也晚、未能亲历科举时代，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充满深情地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

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早已是人们熟悉的文学形象，科举考试本身也不是那么美好，即使以钱穆之博览群书，如果时光倒流也未必能在八股文的战场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不管怎么说，废科举、兴学堂乃近代的一大进步，是晚清新政的一件大事，晚清新政林林总总，其中最有成就的不过三件事：“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清廷于1907年设立学部，要求全国各省普遍开办新式学堂，到1909年各类学堂已有5700所，学生有160多万人，其中有上千所中学以上学堂，学生近20万人。虽然在1905年之前就有个别新式学堂，但真正蔚然成风却是在这之后。留学之风的大盛也是如此，以当时最热门的赴日留学为例，1904年之前只有1300多人，1905年增加到2400多人，1906年猛增到8000多人，使在日留学生总数达到15000人。正是他们带来了近代文明转型的火种，使中国真正开始了走出古代的历程。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有可能诞生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刀切的科举制之下，读书人注定了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换句话说，科举制下面只能产生依附性的传统士大夫，不可能出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除了依附朝廷、依附帝王，诚惶诚恐地山呼万岁之外，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在官场以外还有更广大的世界，个体生命可以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在中世纪的长夜里，只有极个别科举的失败者、完全边缘化的读书人，才有可能挣脱那张无所不在的网罗，以非科举的思维想问题，但不可能形成群体，也没有多少生存空间，我到绍兴看过徐文长的“青藤书屋”，他的诗文书画都是一流的，但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不适应科举之途，终生潦倒，境况凄然，所住的院子窄小，一架青藤，“几间东倒西歪屋”就是真实的写照。那是一个科举制盛行的时代，在这条路上没有走通

的人，很难指望有前途，连过上像样的正常生活都不可能，徐文长的命运、遭遇是必然的。

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学校的兴起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学校不再是帝王政治的附庸，不再是以培养、选拔为帝王服务的奴才为宗旨，近代的曙光就是在声光电色、天文地理中透出来的，而在四书五经中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只能是陈尸的腐气。（现在有人提倡“读经运动”，逃不脱复古、拉历史倒车的嫌疑，其用心到底何在，不难想见）我们可以想象，正是百年前科举制的废除，使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展现在莘莘学子的面前，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前景，他们可以不再做那些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八股文了，做官、为帝王服务不再是读书求学的目标。民族、国家、个人的观念都在科举制废除后浮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科举制是成熟的农业文明、帝王政治下的特殊产物，考试形式与内容是紧密地结合在一切，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尽管西方也有人向往中国古老的科举制，英国甚至模仿科举制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但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大相径庭。中国要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专制政治下跋涉出来，不能不废除科举制，以新式学校取而代之，一百年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科举制的废除利远大于弊，至少从有助于我们破除两大观念，一是破除读书入仕这种千年不动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一元化思维，二是破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具有浓厚人身依附特征的心理习惯。只有在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之后，新型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新兴学校和留学归来的学子中成批出现。

当然，第一代过渡型的知识分子还是按部就班、从科举之路走过来的，比如张元济（1867 年生）、蔡元培（1868 年生）、汪康年（1860 年生）、张謇（1853 年生）等等，他们都是进士，乃至状元，但他们在晚清时代都告别了朝廷，踏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投身的事业都与科举制度赋予他们的翰林

之类角色截然不同。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南下上海开始别样的生活，从 1902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以来，他就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期间 1905 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也正是在他手里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汪康年从《时务报》开始，办过多家报刊，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以办报为业，对推动新兴的报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说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秀才也”！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他生当时代转型之际，他授翰林那年正是 1894 年，后来的戊戌变法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现实的失望促使他辞职南下，决心以办学为业，踏上了一条与旧王朝不合作的不归路。1902 年 3 月，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10 月创办爱国女学与爱国学社，这两个以“爱国”命名的男女校虽然被誉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爱国团体”，但主要还是教育机构。他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不是偶然的。当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还是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塑造了北大，为近代中国的大学提供了一个楷模。更让人不解的是张謇竟以状元身份辞官经商，把工商业作为安身立命的事业来做，这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们分别选择了出版业、报业、教育和工商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初步形成了知识分子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多元格局，当他们告别朝廷、扮演这些新型的社会角色时，他们就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哪怕在有些人身上还拖着一条尾巴。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一个崭新的起点。

我把他们（包括梁启超等在内）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是最早从传统文人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在他们之

前，1874 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就可以说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了，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科举之路走不通了，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相续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士大夫。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以后他以创办报纸，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到 1884 年他的评论选集《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他早已赢得各方尊敬，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不依傍朝廷的另一条新道路。但是王韬只是一个特例，在他活跃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没有蔚然成风。其时离废除科举制还远，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深受王韬影响、后来成为维新运动倡导者的读书人，也还风尘仆仆地奔波于科举路上，为考取举人、进士而不懈地努力着。

第二代知识分子以“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还可以包括学生辈的傅斯年等）虽然多有旧学的根底，但基本上都是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不少人有留学日本或欧美的背景，已从科举的影子挣脱出来。1879 年出生在安徽安庆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在他小时候，“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总之，科举是全社会唯一的出路，即使经商成功，也不会真正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一心指望着儿孙从科举之路爬上去，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是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梦想，也是所有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陈独秀的母亲也不例外，所以这位从小就看不起八股文的中国旧文化的“逆子贰臣”早年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17 岁就中了秀才，那是 1896 年的事。第二年，他又到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